

吴越文化溯源

赵欣

摘要:吴越文化是越族先民在今长江下游一带创造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文化是在越族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周文化元素而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追溯吴越文化的源头可以厘清其早期的发展脉络,揭示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证实人地关系是特定地域文化形成、发展及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吴越文化 起源 人地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 434X (2017) 01 - 0047 - 14

越文化,广义上又称吴越文化,是越族先民在吴越故地,即今长江下游一带创造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越人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河姆渡人、良渚人的后裔。吴越文化是在越族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周文化的元素而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著名的吴越文化学者董楚平指出:“研究区域文化,首先要确定区域范围。”^①荀子曾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②明示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地域文化的形成也对人文环境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所谓“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③因此,研究吴越文化首先要有相对明确的区域地理概念。一般而言,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江浙一带的主流文化,所以也称为江浙文化。正如董楚平先生所言,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其边界并不能像行政区有着清晰的边界线^④,其文化发生影响的地理范围只能大致地按地缘相邻、民族相近、民俗相似等显性因素以“文化带”来大致推定。显然,除了地理因素外,对特定文化带追根溯源更是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的基石。

一、吴越文化萌生的地理环境

据地质学家考证,在距今3.5亿年前的石炭纪,浙江地区的地面开始交替升降,上升的部分变为陆地,下降的地区则变成海洋,再以后长期稳步下沉,最终形成了一片温暖湿润的浅海区。约在2.3亿年前,海西构造运动时期开始,浙江地区原来在浅海区底部的沉积岩层,经受了挤压、褶皱、

作者简介:赵欣,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地理、中外文化交流史;吉林,长春,130033。

① 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荀子·儒效篇》。

③ 《荀子·荣辱篇》。

④ 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断裂和隆生等各种地质力的作用后,形成了一系列的褶皱构造,成为今天西湖群山浙东山区的雏形。^① 而从全球范围考察,自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以来,地球上曾发生过几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过程,地理大环境的变化致使浙江的地理环境也产生了剧变。当冰期的时候来临,大气环流的方向改变,气候带、生物带随之向南转移,海退发生,大陆架显露。而当间冰期来临,气候带、生物带北移,海侵出现,沿海平原渐次沦为浅海区域。因这个时期原始人类已在浙江大地上出现,故地理环境的剧变,直接影响了浙江文化的源流方向。

另据考证,自更新世晚期以来,浙江沿海地区曾发生过三次大海侵,依次为星轮虫(asterotalia)、假轮虫(pseudorotalia)和卷转虫(ammonia)海侵。^② 星轮虫海侵发生在距今11万年以前,海退则发生在距今7万年以前,海侵持续了4万年,而海退(冰期)则持续了2.5万年。在长达4万年之久的星轮虫海侵时期,浙江沿海平原的大部分成为浅海,因此在浙江平原上很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而地处浙西山地的建德县,当时高出海平面,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适合动植物的陆地生存,故在那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犬齿化石,其时的原始人以发现地被命名为“建德人”。新近的研究表明,“建德人”远比以往认为的距今5万年前要早,根据铀系列法所作的新的年代测定,其年代值有两个,一是距今为 9.7 ± 0.8 万年,另一个是 $10.8\pm 0.8-0.9$ 万年。^③ 可见“建德人”的生存时期与星轮虫海侵时期接近(下文将建德人的生存时期简称为“建德”时期)。

“建德”时期,在浙西山地的原始密林中,气候较温和,动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的大量存在表明当时的气候与四川相似。据考古学家测定,“建德人”其时居住在天然的岩洞中,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并且已能使用火。^④ 考古学家对“建德人”研究的新发现表明早在10万年前,浙江的大地上就有人类栖居与活动。在较为暖湿的气候条件下,各种动植物都可以较为顺利地度过生命中的四季,因此在浙江大地上发现人类文明的源头应该是天时地利使然。

第二次海侵(假轮虫海侵)发生在4万年以前的第四纪更新晚期,海退则发生在距今约2.5万年以前。经过15,000千余年海水的侵蚀,浙江原陆地上的生物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海退以后,浙江地带的气候骤然变冷,大片的原始森林枯萎,而大批的动物在海侵之前已逃离浙江,大举南迁。“建德人”或已消失在大海的怒涛中,或流徙异域他乡。“建德人”自身所携带的文明的火种是否燃烧到域外地区的原始人群中尚无从可考。浙江地域在二次海侵后海平面降低,海岸线延长,大片的海底陆地裸露在地表上,形成了浙东平原。舟山群岛亦变成稍高于海平面的低山丘陵,东海海岸线后退了600公里左右。^⑤ “杭州湾以南的岩石海岸……现在位于海拔20-25米、10-25米的高度。”^⑥ 现在位于杭州西湖群山、面向东部杭州湾地段的海拔25米至10米的等高线上下有许多海蚀台阶,这就是浙江早期人类聚落的地址。

此时,由于第三季季风已形成,浙江地区深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半年盛行湿润温暖的东南

① 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 转引自滕复《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③ 转引自滕复《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④ 滕复:《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⑤ 滕复:《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⑥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0页。

风,故气候变得暖热,雨量充沛;冬季盛行干冷的偏北风,降雨较少,气温也低。但是因为“浙江最高峰为1921米,即使考虑到海平面下降,也未达到古雪线的高度,所以在整个第四纪,浙江地区从未受到过冰川的影响。”^①这一有利的气候条件使浙江地区物种的传承不会出现断裂的可能,因而某种生物消失可以考虑到流徙的因素。

198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人员在离浙江北部很近的江苏省吴县东山镇三山岛东泊小山青峰岭下,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其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大约有700多平方米。据考证,该遗址距今约有20,000年。大量的削刮器、砍砸器及稻谷壳的出土,证明浙江地带的人类至少在20,000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进入了刀耕火种的最初的文明时代,而因第四纪海侵而消失的“建德人”的归宿也找到了可能的答案,即按照原始文化的地域流向,山麓文化走向河谷文化的推理,“建德人”从山麓走向平原亦是自然选择和文明走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浙江地域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

自假轮虫海侵后的海退期间,浙江地域的海岸线延长,海平面降低,浙东平原与杭嘉湖平原形成。自然条件随着第三季季风的出现变得更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与发育,因海侵而流向山麓的“建德人”等原始人类从山地走向了平原,发展成为文明程度更高的越族人。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谷壳和鱼骨表明,这些原始人类已开始了平原上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活,兼以渔猎采集等生活方式为辅。第四纪晚期,浙东宁绍平原的形成成为越族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其繁衍生息的基地。后来,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第三次海侵迫使越族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约1万年以前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繁衍生息,逐渐地创造了今天考古学界所谓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应是越族人。正式进入史籍记载的吴越国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与浙江更接近的原始文化便是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②杭州是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地,其发现的具体地点,就在老和山的东南麓,即现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一学生宿舍地域。^③其后,在余杭吴家埠、汇观山、余杭卢村、反山、梅园里、横山;海宁荷叶地、余墩庙;海盐县石泉高地遗址;嘉兴大坟等地发现十余处良渚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址,这为深入研究良渚文化的渊源、流向和变异提供了珍贵的物证。

综上,良渚文化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浙江地区,其特征是一种以稻作为主的原始文化,因此研

① 滕复:《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② 民国二十五年(1936),西湖博物馆员施昕更在良渚镇首先发现一些破碎的陶片,考证为原始社会时期的产物。他据此写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于1938年8月正式出版,“良渚”之名因此轰动了全国。1955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良渚镇附近的朱村发掘出一大批黑陶;1956年对吴兴钱山漾遗址进行发掘,在地层学上取得了突破。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经碳14测定,距今约4000年至5000年左右。这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的古文化。20世纪60年代在吴兴邱城,杭州水田畈,上海青浦县崧泽、马桥,松江富林,江苏越城,吴江梅堰等处发掘,证明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向东延伸到东海之滨,西北至江苏镇江、常州一带。良渚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经过崧泽文化发展而来。浙江地域的良渚遗址群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南部,是天目山余脉的一块谷地,属余杭市良渚、瓶窑、安溪三镇所辖,面积约30万公里。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吴家埠、反山、瑶山、庙前等遗址;20世纪90年代发掘了汇观山、莫角山、塘山等遗址,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玉器、陶器及贵族墓葬和大型礼仪址等,成为良渚文化圈的中心地带。

③ 转引自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就可以大致反映出当时浙江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钺、石镞、石凿、石镰、石犁、破土器等。这些器具的出土表明当时浙江的农业已相当发达,以种植水稻为主,以渔猎为辅。出土的农具表明,水稻的栽培已从耜耕发展到犁耕,且兼植桑麻、养蚕等副业,水上交通也较为发达。生活器具早期以泥质灰陶为主,晚期则盛行黑皮陶,采用轮制工艺,器表或打磨光亮,或刻装饰花纹,主要炊具有鼎、壶、罐、豆等,尤以鱼鳍形、圆锥形、丁字形足的夹砂陶鼎、贯耳壶和竹节形镂孔黑皮陶豆最具特征。玉器制作技术更达到极高水平,器形种类繁多,创造了中国古代玉文化之先河。良渚文化晚期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对研究吴越文化起源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源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闻名于世的越族祖先——“建德人”是属于何种类型的原始人群尚不得而知,但他们在广袤的宁绍平原上生活了很长一个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宁绍、杭嘉湖平原上辛勤劳作,创造了多元化的原始文明,为后世的考古发掘积聚了大量的宝藏。在距今约1.2万年前左右,卷轮虫的海侵开始了,无情的海水再次席卷了越族人的家园。海岸线位于现在水深-110米处,到了距今1万年前,海平面上升了40米左右,达到了7000年—6000年前的最高峰。^①浙江沿海平原几乎全部沦为浅海区。与此同时,自然条件迅速恶化,越族人的栖居地也开始向高处迁徙。据考古学家考证,越人此时的迁徙出现了变化,他们由原来集中的单向性迁徙转变为复杂的多向性迁徙。其主要流向有二:一支向内陆迁徙,向南部丘陵高地转移,进入会稽、四明山区。这些流向了中原内陆地区的越族,在海拔较高处逐渐建立了河姆渡、马家浜、罗家角、彭城、谭家湾、吴家浜等距今约7000年的原始聚落,成为《越绝书》中所称的内越,^②或称“于越”。另一支先民越过钱塘江迁徙到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区,史称“句吴”。于越与句吴是一个部族的两个分支,伍子胥、范蠡都曾指出吴越“为邻同俗”“同气共俗”,^③它们在原始风俗文化方面具有共通性。处于东海大陆架附近的先民首先迁徙,以舟代车,顺流而下,乘独木舟漂洋过海,漂向琉球群岛、日本列岛、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即所谓的“外越”或“东海外越”。^④越族人迁徙方式的变化折射出他们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有所提高,原始文明在不断地向更高阶段演进。按照近年来的多数考古学家的共识,浙江原始社会文明区可概括地分为四个阶段,即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⑤→崧泽文化^⑥→良渚文化,这些都属于新石器时代

① 滕复:《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② 滕复:《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③ 《越绝书》卷6,《越绝外传记策考》卷7《越绝外传记范伯》。

④ 《越绝书》卷2、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

⑤ 马家浜文化:1959年初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马家浜地方居民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西南7.5公里,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掘区在遗址的中部,共布探方5个,计213平方米。表土层下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上层以灰黑色黏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厚达12-80厘米,包含物有兽骨、石镞、砺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下层为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的黑色黏土,厚达15-75厘米,包含的兽骨比上一层更多,还有骨管、骨锥、骨针、骨镞以及石斧、砺石和陶片等。

⑥ 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4900年,属新石器时期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得名。而浙江的南河浜遗址位于嘉兴市大桥乡,1996年在配合沪杭高速公路取土工程的考古调查中发现。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座、崧泽文化墓葬92座,以及崧泽文化祭台1座、灰坑24个、房屋7座,出土玉、石、陶器等遗物700余件,为研究崧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29页。

的文化层。迄今为止,浙江省境内已发现了百处以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他们的共性在于,这些遗址大都处于水网地带或河流湖泊的阶地、台地上。^①遗址的近水域性表明了浙江原始人类与海洋生活的密切关系。吴越地区居水临海的地理条件,拥有“鱼盐之利”和水路交通之优势,与域外商贸往来便利,双向文化互动频繁,且大海具有浩渺宽阔的水域,近吞内陆百川,远接异国他乡,烟波氤氲,因而造就了吴越人的外向、重商、开拓的性格;吴越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

二、吴越文化的族源与特征

越族是居于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的古老民族。由于其族团支系众多,分布范围甚广,因此史称“百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②这里的“粤”即指越族。另据清《四库提要·百越先贤志》所载:“南方之国,越为大,自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其著者东越无诸,都东冶,至漳泉,故闽越也;东海王摇,都于永嘉,故瓯越也;自湘漓而南,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统而名之谓之百越。……百越先贤……兼及会稽,以勾践旧疆,自南越北,尽会稽故也。”由此可见,吴越文化主要起源于春秋吴越国时期,其文化核心地带是在浙江绍兴一带(绍兴古称会稽)。根据分布地区的不同,越族又有不同的具体族称,如“于越”“句吴”“闽越”“瓯越”“南越”等等。“于越”也称“於越”“大越”“内越”,是百越中比较发达的一支,分布在以会稽为中心的浙江一带。关于于越的族源,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夏人苗裔说”;(2)“楚越同源说”;(3)三苗集团后裔说;(4)南太平洋马来人种说;(5)江、淮徐族后裔说;(6)“于越是土著族”等等。^③

因海侵而被迫迁入山区后的于越部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停滞在刀耕火种的迁徙农业和狩猎阶段。据传,于越部族的最早首领是无余。《越绝书》载:“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④《吴越春秋》载:“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於越,号曰无余。”^⑤无余定都会稽山地,一说埤中(今诸暨市),一说嵯岷(今绍兴县)。“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纔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⑥这些零星的记载反映了越国初创期不设宫殿,与民同处,生活条件艰苦,但其封建王朝的王位相承制却十分明显。

无余以后的二三十世历代越王,一面艰难地发展国内经济文化,一面加强与中原西周王朝及周边诸侯国的接触。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周成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11世纪)“於越来宾”,始向中央周王朝朝贡。越国到允常执政时期,逐渐强盛起来,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越王允

① 章隆福:《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 又见(唐)杜佑《通典》卷184。

③ 参见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1-132页;滕复等主编《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41页。

④ 《越绝书》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

⑤ (汉)赵晔著,(元)徐天祐音注:《吴越春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99年,第10、93页。

⑥ (汉)赵晔著,(元)徐天祐音注:《吴越春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99年,第101、102页。

常为开拓疆土,扩大权势,曾与吴国进行过几次战争。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越王允常卒,勾践即位,迁都平阳(今绍兴平水镇平阳),向会稽平原地区发展。翌年,吴王阖闾乘允常之丧伐越,勾践出兵与吴军交战于携李(今嘉兴西南),吴兵败,阖闾被射伤中毒而死。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即位,为报父仇,于公元前494年再度伐越,败越于夫椒(太湖椒山)勾践带残兵五千,退守会稽山。勾践向吴屈辱求和,“入臣于吴”,为人质3年。公元前490年,勾践被释放回国。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推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经过“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国力逐渐恢复,由弱变强。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乘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际,向吴发动攻击,越军水陆并进,攻陷吴都姑苏(苏州),吴被迫求和。公元前475年,越再次发起攻击,围吴都3年,迫吴投降,吴王夫差自缢身亡。公元前473年,吴亡。

越灭吴后,勾践“乃以兵北渡淮,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山东滕县)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①同时,勾践由会稽迁都到山东瑯琊,领土已过淮水以北,与鲁国接壤。越已成为春秋末期霸王、东南大国。

公元前465年(周定王四年),越王勾践卒。勾践后,历八代。前四代时越国尚强,曾消灭过滕、郟、缙几个小侯国。但是由于内部宫廷的斗争,国力迅速衰弱,公元前379年,越国由瑯琊迁都吴(今苏州市)。接着宫廷内讧加剧,几年内,“三个国王被谋杀。到末代王无疆时,内乱不止,越国大势已去。公元前334年,楚军大败越兵,杀无疆,夺占吴故地,直至浙江(钱塘江)越国被楚灭。但无疆失国后,越国并没完全消亡,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指出:“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海上,服朝于楚。”直到公元前222年,秦始皇派大将王翦灭楚平江南之地时,“降越君,置会稽郡”,^②越国最终灭亡。

考古资料也进一步印证,于越与句吴皆是越族部族流迁中的两个分支,有着同一的原始文化源。虽然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中原华夏民族的影响下,于越和句吴以不同的模式组建了吴越两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称王争霸,相互厮杀,战争不断。然而,“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③“同气共俗”、“为邻同俗”。他们在承继共同的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在太湖周围、杭州湾一带地域拓展了吴越文化区,形成并丰富了吴越文化。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吴越文化的地方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我们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④将吴越文化的显性特征从两个方面加以概括:

第一,吴越文化物质层面的主要特征有:(1)以种植水稻著称,是中国及亚洲的水稻重要发源

① 《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46、1751页。

②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4页,《史记》卷2《夏本纪》,第83、89页。

③ (汉)赵晔著,(元)徐天祐音注:《吴越春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99年,第86页。

④ 主要参照吴越文化研究会《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国际百越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浙江省文物局等《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滕复等主编《浙江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方杰《越国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地之一,是稻作文化的中心地域;(2)吴越地区是世界上养蚕缫丝业的发源地;(3)几何形印纹陶器原始青瓷和有段石磬的普遍使用和流传;(4)青铜冶炼有着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青铜宝剑的铸造技艺极为精湛;(5)善于使楫驾舟,造船业发达。越国时在造船方面已有相当基础,有造船基地,能造楼船、戈船、翼船等各种类型舟船,大型战船有楼船、戈船,还有“桴”(即“筏”)、“方舟”(两船合并连接而成)、“下濑船”、“大翼”、“中翼”、“小翼”等等大小不同类型的战船。^①造船业的发展,拓展了航海活动领域,从近海交通扩大到远洋交通,从军用扩大到海上运输、海外贸易,发展了同邻近地区民族、国家的往来;(6)习于“巢居”,住“干栏”式房屋;(7)饮食上除了以稻米为主食外,还喜食鱼、龟鳖、蛤、螺、蚌等水生食品。

第二,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非物质层面的显性特征有:(1)语言的独特性,越族语言是黏着语,一字数音,不同于汉语的孤立语,一字一音;(2)文字上虽与古代中原人使用的篆书一样,但在每字之旁附加鸟形纹饰,故称“鸟篆”,所以,一般人就认为越人使用“鸟书”;(3)蛇图腾崇拜、鸟图腾崇拜普遍存在。吴越文化中的“鸟图腾”也从侧面说明了其文明具有“萨满主义”的文化基质。^②其鸟虫书的文字,也与其对鸟和蛇的图腾崇拜与密切关系。宋人田锡曾说:“江南岁多不稔,农鲜服勤,信卜筮而佞鬼神,弃耕桑而从网罟,是以民无土著,家无积储。”^③这说明吴越文化中存在佞神的倾向,宗教祭祀过频过重,以至于误了稼穡农耕;(4)流行断发文身习俗。“断发”即剪短头发,不束发加冠,明显不同于中原商人、周人的束发加冠的装束习惯;文身,即在身体表皮上用墨刺出各种永久性图案;(5)未发现重男轻女现象。吴越文化可贵的一面是男女平等。勾践返国后,范蠡声言“同男妇之功”。勾践奖励生育,“生男给犬,生女给豚”;女性也同男性一样习武弄剑,表现出了吴越文化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与重视;(6)吴越文化有轻死易发的民风,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百姓的仁爱。勾践的三百死士,受辱即殉道,殉葬墓的长期存在,乃至勾践的卧薪尝胆也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文化中这种单一轻死重义的情结。逝者多使用石室墓。

三、吴越文化的传承与转型

吴越文化区形成后,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的发展态势,使吴越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百姓的意识形态中。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吴越文化区几易其主,与中原华夏文化以及毗邻的楚文化被动地发生了交流与融合,经历了几个关键的转型期,致使吴越文化的内核发生了质的变化。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派大将王翦消灭楚国,降服越君,平定江南,遂置会稽郡,辖24个县,属今浙江地区的计14个县。为加强对越故地的控制,秦政权强制迁徙越民到浙西余杭、乌程等山地。同时,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会稽地带。《越绝书》记载:“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④以后,到汉武帝平讨闽越时,又把东瓯(越)、闽越徙迁到江淮一带至更远地区,分而治之,使东瓯人、闽越

① 林华东:《吴越舟楫考》,《东南文化》第二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 陶磊:《萨满主义与吴越文化:理解吴越的一种方式》,《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③ 《太平令贾昭伟考祠》,《全宋文》卷88。

④ 《越绝书》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

人逐渐与汉人同化融合。再有东晋时期发生“永嘉之乱”，朝廷迁至吴越地区的建康(南京)，为避战祸，大量汉人随之迁入吴越地区。华夏民族在这几个朝代中的被动迁徙使吴越地区由原来的夷越文化为主导转变为汉族文化为主导的区域文化，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型转为汉代以后的崇文型，是为吴越文化的第一次转型。

秦、汉、晋朝时期统治者施行的这些政治措施的目的在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吴越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秦汉时期的浙江经济，虽然仍比中原地区落后，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与统治机器的加强，长期混战状态逐渐结束，社会日趋稳定，经济有了缓慢的发展。当时的社会状况，《史记·货殖列传》有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眚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① 农业的进步是秦汉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表现。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确立，佃耕制的实行，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进提高，铁制农具进一步推广。绍兴漓渚出土的许多铁锄、铁犁，表明这个地区使用铁制农具已很普遍。在耕作技术上，牛耕已很普遍。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东汉光武帝(25-56)登位不久，在今慈溪鸣鹤(汉属句章)修治了杜湖、白洋湖等湖泊蓄水灌溉农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郡山阴县界筑塘蓄水，兴建镜湖，旱时泄湖灌田，涝时排水入海，消除旱涝灾情。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余杭县令陈浑筑南上湖南下湖，沿苕溪一带增建塘堰陡门数十处，灌溉农田1千余顷，7千余户受益。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城市手工业得到了发展，行业种类繁多，有的已达相当规模。盐、铁是两汉手工业的重要部门，由政府控制，郡县设“盐官”、“铁官”。据《汉书》记载，全国有“盐官”35处，会稽郡的海盐就是其中之一。^② 秦汉时，造船业进一步发展，造船技术大幅度提高，多桅多帆的木帆船已经出现，楼船已具有帆、舵、碇等设备。会稽及其南部的平阳、福建沿海一带成为造船业的重要基地。铜镜制造业发达，铸造技术、艺术都超过了吴越时代；会稽制造的车马镜等造型别致花纹精美。陶瓷业亦普遍发展，在上虞、余姚、宁波、永嘉等地发现多处两汉(主要是东汉时期)的陶瓷窑址。上虞上浦乡发现的小仙坛青瓷窑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青瓷生产地。小仙坛古窑烧制的青瓷器，釉色青绿，晶莹靓丽，胎质细腻坚硬。宁波江北区的郭塘岙、八字桥、鄞州的九缸山、慈溪上林湖等地发现的青瓷，都证明浙东一带是中国青瓷的故乡。纺织业普遍发展，东汉时，会稽一带织造的“越布”闻名全国，光武帝刘秀“见而好之”，就把越布列为贡品。

隋朝时期，大运河的开凿使洛阳与杭州两个极点上的工商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杭州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檣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③ 商业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大运河开通后，浙江整个地区的经济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商业繁荣，人口增加，余杭、会稽、东阳、永嘉、遂安五郡计有73,341户。^④ 吴越地区水路交通十分发达，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京都，或入钱塘江南下，东至明州可出海，向北可跨杭州湾到

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② 《汉书》卷28上《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1页。

③ 《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④ 据周峰主编《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页统计。

达嘉兴,占尽了交通优势,商业极为兴隆。以杭州为例,地处江南运河与钱塘江、浙东运河之交汇点上,到唐中期时,已“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①杭州城发展成为城周70里,人口20多万的区域中心城市。浙中南部的婺、衢、台、温、处5州秉承传统的地区优势,共有389,176户,超过了北部和东部的杭、越、湖、明、睦5州和嘉兴、海盐2县368,665户。^②而这一时期,吴越地区的丝绸纺织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该地与域外文化交流提供充足的物质支持。越州素来丝织业极发达,是向唐政府贡赋丝绸的重地。唐政府为加强对越州贡品的管理,在中唐时设观察使于越州,越州成为江南丝绸贡品的中心,每年向朝廷进贡的除了传统的文梭白纱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纱、吴绫、吴珠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种”。^③越州“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④丝织品种类繁多,织工精美,宝花罗、花纹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吴绢、花纱等名目各异。^⑤水路交通的发达带动了商业繁荣与精细型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吴越人的“水柔”特性和缜密细腻的文化传统。

唐朝末期,“安史之乱”至大量汉人避乱迁入江南吴越旧地,中原文化再次对吴越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唐朝之后,杭州人钱鏐建立了吴越国。“吴越国”的名称一方面使吴越文化区有了与行政区划相重合的明确划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当地百姓的心理上强化了吴越文化的地域特征。吴越国在其极盛之时所辖的领土包含了13州和1个军,13个州包括杭州、湖州、温州、越州、台州、明州、处州、衢州、婺州、睦州、秀州、苏州以及福州,一个军是指安国衣锦军,^⑥都城为杭州,所辖疆域囊括了今天的浙江全省、江苏省的西南部和福建省的东北部。就领土面积而言,吴越国较五代十国的诸多国家而言,是个当之无愧的小国。然而,吴越国——这个并不被世人所看重的东南小国,却以其发达的文化水准和开放的经济姿态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吴越国政府实施保境安民的怀柔政策,为江浙地带的经济繁荣与吴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政治环境。(1)钱氏政权自始至终都在执行着“善事中国”的政策。所谓“善事中国”,就是向中原朝廷进贡金银珠宝,用金钱来维系与中原的和平关系,以使吴越国在乱世之中能够“独善其身”。同时,积极出台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手工业和农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2)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加强与东南亚、东亚等国家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吴越政权充分利用先朝建设的水上交通系统,完善浙江地区港口的设施,杭州、明州、温州等港在这一时期得到扩建。吴越国的统治者还在明州等重要港口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活动的专门机构——博易务。在博易务的统辖下,吴越国有序地开展了与日本、朝鲜、大食等国的政治经济贸易往来,彼此建立了密切的文化互动关

① 《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② 《旧唐书》卷40《地理志》3。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越州。

④ 《樊川文集》卷18《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⑤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⑥ 唐末五代时期,营、城、军等都是一地方行政单位,三者之中,军的级别最高。安国衣锦军的产生过程如下:唐光化二年(899)改临安县安众营为衣锦营,天复元年(901)升衣锦营为衣锦城,天祐四年(907)又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另外,在《吴越备史》、《新五代史》、《十国春秋》等史籍中都可以见到有关安国衣锦军的相关内容。

系,促进了吴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流动。据《新五代史》记载,925年,吴越国“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拜封其君长”。^①吴越国还主动多次派员使往日本求贸易文化互通,日本的僧侣进入江浙地带,与号称“东南佛国”的吴越国进行了佛教文化的多元交流。(3)审时度势,避战图存。弘俶太平兴国三年(978),为使境内黎民百姓免遭涂炭,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将吴越国所辖之地悉数献与赵宋王朝,存续了72年的吴越国由此寿终正寝。这进一步表明了吴越人对战争的排斥和对和平的渴望,充分展示了其文化的水柔特性。

然而,“靖康之难”使南宋政治中心被迫迁至临安(杭州),北方文人学士以及大量的汉人移民再次随君南下,入主吴越旧地,致使吴越最繁华的都城杭州的本土文化再次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冲击。官方通用语由吴语改为北方官话,杭州话夹杂着外来语也变成了与吴依软语区别很大的语言;崇文轻武,科举取士成为吴越文化的精粹;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思想,吴越文化完成了第二次转型。范成大《吴郡志·风俗》中载:“本朝文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惟其所谓尚礼、敦庞、澄清、隆洽之说则自若,岂诗所谓美教化、移风俗者与?”^②从南宋朝开始,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吴越文化也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地域文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吴越成为国人称羨的“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明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间,共出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计244人,其中以江南为主的吴越故地人计215人,占88%,整个北方地区计25人,仅占12%。清代114名状元中,江浙两省共有69人,占全国的69%。^③

第三次转型发生在鸦片战争后。鸦片战争绝不仅仅是普通的军事战争,而是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直接冲突。妄自尊大,封闭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突飞猛进,具有崭新世界观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吴越文化区的核心地带上海、宁波成为最早遭受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冲击的前线,带动了吴越文化区的第三次转型,即吴越文化从传统步入了近代。其主要变化体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伴随着大量舶来品的入市,大量的西方科技文化、商业理念和应用人才涌入上海、宁波等口岸城市,吴越地区的人们最早感受到了异质文化的强势入驻和西方先进科技所带来的令人惊诧的生活巨变。船坚炮利、蒸汽动力、机械化生产等一系列目不暇接的现代科技使聪颖内敛的吴越人开始反思自身的狭隘和自大,之后迅速进行学习和效仿。吴越人快速向上海、宁波等口岸集聚,通过各种手段赚取财富,形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商会,在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政府官员的带动下,效法西方开办轮渡公司、洋行、军械厂、轮船厂、蒸汽机厂,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成就了一大批吴越商人和企业家。随着商品交换与工业的发展,西方的科技人文思想也在吴越旧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明末清初,善于接收新生事物、具有宽广海洋文化特征的吴越人中就涌现出了与早期入华传教士产生密切接触的近代科学家上海人徐光启、杭州人李之藻等“西学派”领袖,首开自然科学研究之先河。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热潮迅速在吴越地区成为主流。中国西学派领袖李善兰(海宁人)、王韬(吴县人)、徐寿(无锡

① 见《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

② (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页。

③ 参见靳怀《水与中华区域文化——以吴越文化为例》,《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人)、华衡芳(无锡人)、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都是吴越人。他们既通经史,又重视天文数学、盐铁河漕等多种科技实用知识,主持筹办了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近代印书、译书机构,出版了一系列西方科技人文图书。同时,他们还与西方传教士等合作创办中英文报纸,筹建新式学堂。这些西方译本、报纸与学堂共同宣传新思想、新科技,一时间使吴越地区民风大开,吴越子弟迅速脱离了传统私塾教育,走进新式学堂学习西学。西学的广泛流传使吴越地区的文化内涵焕然一新,新型知识分子在中西学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经济理想,并将之付诸实践。如张謇在南通试行地方自治,张元济罢官后在上海搞文化维新事业。义和团运动时期,吴越地区奉行“东南互保”而免遭涂炭。这些新思想和新举措既体现了吴越文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潜能,更进一步体现了吴越文化中的水柔特性,即重商崇文而轻农恶武。

四、吴越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其影响

吴越文化不仅在青铜冶炼铸造、玉器雕琢、丝绸纺织等方面对中原文化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因其本身外向型的海洋文化特征,远被东南亚、东亚甚至欧洲大陆。远在距今7000年前,越族先人为逃避卷转虫海侵的侵袭,一支向内陆丘陵高地流散,另一支则利用原始航行工具,漂洋过海,流迁到了日本列岛、南洋群岛、中南半岛。留在内陆高地的人群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到了商周、春秋战国时代,越族先人入主江南之地,三国激烈争霸,形成了楚、吴、越三国相互残杀的历史局面。越人深受战祸之苦,一部分人无奈逃生海外。公元前222前秦王翦灭越后,秦又发兵攻岭南,强制徙民数十万,越人被迫再次远离故土逃亡海外,太平洋周边地域成为其迁徙的主要方向。越国被灭亡后,越人向南方及沿海岛屿迁徙,深入到中印半岛,或跨越南海到达南洋群岛;或由东南沿海一带渡海到台湾,经台湾再渡海到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就这样把吴越文化带到了东南亚,而古越族也就成为东南亚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考古资料看,其新石器时代的石砬、有段石砬和几何形印纹陶器,都与我国福建、台湾出土的相似。从民族的精神文化分析,东南亚一些民族还保留蛇图腾、文身、“短发”、喜食海产、住“干栏”式房屋等习俗,这些都表明其受吴越文化的持久影响。古代越人擅长航海,他们流徙到南洋群岛后,穿越于太平洋一带的岛屿之间,夏威夷、波利尼西亚(意即“多岛群岛”)等地的考古资料表明,有段石砬的分布面很广,新西兰也发现这种类开支的石砬,这就为越文化远播南太平洋、大洋洲提供了佐证。越人在加强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广泛传布了吴越文化,给环太平洋地域各部族、民族以很大影响。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汉武帝为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以清除匈奴的威胁,拓展西部疆域,在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和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先后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长达17年,行程万余里,终于打通了从长安开始一直绵延到地中海东岸的陆上交通线。东汉时,随着迁都洛阳,丝绸之路的东端也就延伸至洛阳。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内地与新疆各族的友好和睦,而且加强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张骞通西域后,中西陆路畅通,驼铃悠悠,中外使节、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吴越旧地的丝绸,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以及地中海沿岸一带,因此,后人就把这一通向西方的交通大动脉誉称为丝绸之路。几乎与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同步,汉武帝在发展近海航运基础上,积极拓展海外交通线,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秦汉以来,

当时的海上交通可分为东洋航线(或称北航线),以及南洋航线,前者由中国沿海港口经东海、渤海、黄海抵达朝鲜、日本;后者由东南沿海港口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再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浙江位于东海之滨,正处于我国海岸线中部,是东洋航线和南洋航线的交汇点,也是两条航线的重要始发港口,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路上占有重要地位。公元1世纪,一位居住在亚历山大的操希腊语的船长或商人,以其长期航行于印度洋海岸的经历,撰写了《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第一次提到了“秦尼”的名称,勾勒出了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经过这一地区(恒河一金州)之后,就已经到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秦尼(Thinai)。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意为丝国的)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至婆卢羯车(Bary 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要进入该国(赛里斯国)并非易事,从那里来的人也极为稀少罕见。”^①而这里的丝国中心即是吴越旧地,勾通海外贸易的“丝绸之路”之“丝绸”即为吴越地区主要的手工艺品——丝绸。吴越文化以丝绸为纽带,向世界各地辐射。随着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通畅,丝织品外销不断增加,进一步带动了浙江丝绸业的发展。据《后汉书》载,东汉名臣朱儁是会稽郡上虞人,“少孤,母尝贩缿(丝绸)为业,时同郡周规……假郡库钱百万……儁乃窃母缿帛,为规解对”^②。一位寡妇经营丝绸贸易,被儿子偷去的丝绸价值百万,转手出售,为其友还债,可见当时丝绸贸易市场的繁荣。产于会稽的“越布”、铜镜等物也远销日本、南洋和西域各地。西域和南洋各地的物品也陆续传入浙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从宁波汉墓中出土的水晶、玛瑙、琥珀等饰品看,“经考证系舶来之物,证明这一时期已有外国商船往来。”^③

南洋航线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吴越文化的远播及其对域外文化的影响。南洋航线沿粤闽海岸延伸,与东洋航线衔接,东瓯、句章就成了交汇点,更进一步促进了浙江海外贸易的发展。隋唐以来,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内陆地区与海外贸易更加繁荣。得天独厚的吴越海港愈加繁忙。江浙地区的丝绸品、瓷器、铜器、漆器还远销至地中海沿岸,罗马更是江浙丝绸的主要销售地。南亚和西方各国的珠宝、香料、琉璃、玛瑙、水晶、象牙、犀角、玳瑁、皮毛等珍宝奇兽也传入中国。为了满足海外贸易的大量需求,浙江手工业、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会稽(绍兴)、句章(今宁波西)、回浦(今台州)、东瓯(今温州)成了重要的贸易港口,内外商品多在附近交换。从宁波市郊、鄞州、慈溪、象山等地出土的汉墓葬品看,发现很多铜镜等青铜器皿,主要来自会稽漓渚制品,可见商品交换已有相当规模。在与海外国家进行频繁贸易往来的同时,吴越文化也乘风破浪,远渡重洋,在域外地区生根发芽。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为吴越与域外文化的互动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使吴越文化打上了鲜明的海洋文化烙印,使外向性传播成为其首先主体特征。

因地域相邻,地质变迁等多重元素,台湾是卷轮虫海侵时越族祖先选择南向迁徙的首先目的地。吴越人利用独木舟或竹筏等工具,直接出吴越至台湾,或辗转陆路先至福建,再至台湾。台湾出土的大坵坑文化、凤鼻头文化等都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公元前437年(周考王四年),越国攻灭吴国。前334年(周显王三十五年),越国又被楚所灭。“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

① [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页。

② 《后汉书》卷71《皇甫嵩朱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08页。

③ 宁波市交通志编审委员会编:《宁波市交通志》,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年,第5页。

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①这里的“滨于江南海上”应当包括台湾、澎湖。秦汉时期,因战争之需吴越地区的人民或被动性地被迁徙至台湾、澎湖一带,或主动地避战乱流徙至台湾。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就曾记载了东吴孙权征伐夷州之事。所谓“夷州”即是指台湾,白鸟库吉、林惠祥、凌纯声等学者分别从地理、气候、物产、风俗、文物等方面论证了《太平御览》等古籍中所说的“夷州”即指台湾。另,史书所载的夷州土著居民(高山族的祖先)与古代越族亦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断发文身、蛇图腾、巢居、犬祭等等,这至少说明夷州土著居民极可能是越族人的一支。^②

日本是吴越一衣带水的近邻,亦是越人迁徙的主要目的地,深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根据日本的考古资料,日本的稻作文化源于中国江南的吴越地区,而且,很有可能从杭州湾或浙东沿海经海路直接传播到日本九州地区。中国稻作文化的传入,使日本由采集渔猎为主的绳文时代转变到以农耕为主的弥生时代。在物质文化方面,除农耕技术、农具等弥生时代的器物外,其他的物质生活器材如玉石器、漆器、木器等,都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器物相似。弥生时代的日本人食稻米,住“干栏”式房屋,喜吃生鲜水产品,物质生活习惯近于吴越地区。在精神文化方面,古代日本人的蛇、鸟图腾崇拜,文身习俗,占卜崇巫,服饰头饰,乃至使用木棺、石棺及坟丘墓等丧葬习俗,都与吴越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③东汉时,会稽的越布(葛布)和越窑生产的青瓷器已开始外销到亶洲(今日本西南部各岛屿)和南洋各地。《汉书·地理志》云: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④《后汉书》说:“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入海行遭风,流移至亶洲者。”^⑤学者认为亶洲是指今日本列岛。这说明,日本人在秦汉之际来会稽郡鄞、郾、句章贸易已较频繁。《后汉书·东夷列传》中的“倭”专条明确记载了倭人与汉王朝通交情况:“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⑥可见,汉与“倭”的交往,除直接渡海到九州一带外,大都由东洋航线经循朝鲜半岛沿岸到日本。浙江是东洋航线的主干线。隋唐时期,前往吴越地进行贸易和文化交往来的商客、僧侣更是络绎不绝,日本的天台宗、净土宗等佛学流派就是此期从吴越地流入日本的。后来唐朝鉴真东渡、明季朱舜水、雪舟西来等文化交流名人更是层出不穷。

越南是中国南方近邻,是古代南方百越族的一支,南越族的栖居之地。“安南自古交通中国”,“民文身,效吴越之俗……暑热好浴于江,故便舟善水”,^⑦习俗类同越国。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后,服朝于楚,越族“以此散”,^⑧被迫离开故园,散走各地,有一部分到了东南亚一带。公元前214年,统

① 《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51页。

② 参见徐建春《吴越文化对台湾的影响》,《浙江学刊》1993年第5期。

③ 安志敏:《从日本吉野夕里所看到的中国江南文化》(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国际百越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4-406页;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29-139页,第151-161页。

④ 《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69页。

⑤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22页。

⑥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20页。

⑦ [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注:《安南志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13页,第41页。

⑧ 《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51页。

一了岭南百越之地后,设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象郡的范围包括今越南中部、北部和广西南部一部分。秦从中原、内地徙大批人口到岭南与越人杂居,同时委派任嚣为南海郡尉,赵佗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公元前207年,秦亡。前204年赵佗按任嚣的密谋,“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①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汉朝建立初,汉高祖刘邦派陆贾使南越,仍册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向汉王朝称臣纳贡,保持友好的臣属关系。赵佗统治南越时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输入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铜、铁、田器、马、牛、羊,广泛应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发展煮盐、纺织、制陶、冶铜、漆器、造船等手工业。赵佗推行汉化政策,倡导使用汉字,仿效汉律,尊重汉室委派的官吏。赵佗的政治措施促进了南越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了汉越两族人民的友好交流。另据考古发现,在马来半岛南端柔佛河流域遗留的波浪纹青瓷器是上虞小仙坛东汉瓷窑的产品。在西婆罗洲的三发,还发现了汉代越窑的青釉龙柄魁。^②

吴东晋南朝时期,浙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也都有贸易往来。江南的织锦作为名贵奢侈品,也传入了高句丽。在1972年发掘的吉林集安地区长川2号墓中出土了一块织锦残片,组织致密,据专家考证,这是江南地区的产品。^③而浙江地区的一些佛教流派,如天台宗、净土宗等也很早就传入了新罗。

至隋唐时期,吴越文化对域外地区的影响更是达到了顶峰。根据考古实物印证,当时越窑青瓷以其精良的质地遍及朝鲜、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伊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埃及、苏丹、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南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④甚至还远播至大秦(古罗马)。

自古以来,具有明显外向性海洋文化特征的吴越文化跨越了水域的阻隔,远播至北太平洋周边的朝鲜、日本,甚至远播到南太平洋各群岛、大洋洲和美洲西海岸临太平洋地区,对域外文明产生了影响,促进了浙江地区与域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给吴越文化注入了持久的外向动力和新鲜血液。

责任编辑:明 阳

① 《史记》卷123《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7页。

② 《浙江省绍兴市:对外经济贸易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第69页。

③ 《吉林集安市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④ 章隆福:《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Northeast China firstly is expressed as the archaeology culture in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areas, then the following is various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s both a vivid regional culture and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 ancient culture, archaeology culture, national culture

Discussions on 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ethnic Culture in Kashgar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also on the Formation Bases of Uyghur Culture Zhao Binqing 037

Abstract: Kashgar is a very important area where ancient multi-ethnic groups were distribu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ity occurs continually. Judging from the motivation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ethnic groups' culture in Kashgar, the spatial movement of ethnic groups and population generated the different cultural elements involved into it in different times constantly. In results, ethnic culture in Kashgar is always in differentiation, recombination, and integration continually. At the same time, being in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s, Uyghur culture was found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slam. While the environment of Kashgar is the natural basis of Uyghur culture.

Key words: kashgar, ethnic culture, cultural integrity, Uyghur culture

Retrospect to the Origins of Wuyue Culture Zhao Xin 047

Abstract: Wuyue Culture,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typical regional culture created by Yue nationalities in whom lived the lower part of Yangtze River. On the basis of the primitive culture of Yue ethnicity, Wuyue Culture developed gradually in absorbing Sangzhou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To retrospect the origin of Wuyue Culture could clarify its traces in early times, disclose the great impacts of environment on humanities, and tes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ies and regions is the critical element in decid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formation, developing and vicissitude in certain areas.

Key words: Wuyue Culture, orig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ies and region

Discussion on Wanning Palace of the Middle Capital in Jin Dynasty and the Summer Palace in Qing Dynasty Jing Ai 061

Abstract: Wanning Palace is the temporary palace built in 1140(Huangtong, Jingxizhong, 3rd year), and extended massively in 1179(Dading, Jingshizhong, 19th year). Because Wanning Palace is near to Mid-capital of Yuan, it became the emperor's place of interest, where Emperor Jinzhangzhong built a Dresser for his concubine on Qionghua Island. Wanning is the general terms to Qionghua Island and its surrounding lakes, including Beihai lake and Zhonghai. In the inner part of Dadu in Yuan Dynasty, and the palac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ccupied parts of Wanning Palace, where there existed the evident inherent relationship.

Key Words: Jing Dynasty, Wanning Palace, Old Palaces of Ming and Qing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Nuo Drama in Southwestern Part in Qing Dynasty Chen Jijun 066

Abstract: Nuo Opera in Southwestern China in Qing Dynasty was very popular on its unique culture circum-